

区域创业文化与发展模式比较研究

——以中关村、深圳和温州为案例

辜胜阻, 李俊杰

(武汉大学 战略管理研究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辜胜阻(1956),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主要从事创新与高技术产业经济、民营经济与企业战略等方面研究;李俊杰(1980),男,河南淮滨人,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创新与高技术产业研究。

[摘要] 创业文化包括价值体系和环境系统两个方面。我国北京中关村、广东深圳和浙江温州三地在致富欲望、创业冲动、吃苦精神、流动偏好、冒险精神、合作意识等区域创业文化价值系统方面的不同,导致了其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存在较大的差异。研究认为:区域创业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软实力”和“软环境”,对区域发展模式有着重大影响。

[关键词] 创业文化;企业家精神;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7)01-0005-07

创业文化是指在创业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思想意识、价值标准、基本信念、行为模式和制度法规的总和。积极的创业文化是企业家和创业者们的精神动力和发动机,是创业企业诞生与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柱。区域创业文化和企业家精神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本文在提出创业文化的价值体系和环境系统的基础上,对我国北京中关村、深圳和浙江温州三地的区域创业文化和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和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区域创业创新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软实力”和“软环境”,对区域发展模式有着重大影响。

一、创业文化的价值体系和环境系统

创业是创业者将人才、项目、创意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进行组合,创立基业,以实现其目标价值的实践活动。创业理论是与企业家的研究紧密相连的。1755年法国经济学家坎梯龙(Cantillon)将“企业家”这一术语引入经济学理论,主要强调其风险承担功能。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将“企业家创业精神”概括为5个方面:一是“首创精神”。二是“成功欲”。企业家“存在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他求得成功不仅是为了成果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三是“甘冒风险,以苦为乐”的精神。企业家“存在有创造的快乐,把事情做成的欢乐,或者只是施展了个人能力和智慧的欢乐……以冒险为乐事”。四是“精明理智”。企业家“为了他的成功,更主要的与其说是敏锐和精力充沛,不如说是某种精细,他能抓住眼前的机会,再没有别的”。五是“事业心”,即注重取得信任和计划的可行

性,以“说服银行家提供资本实现生产方式的组合”,企业家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刺激中取得创新成功^[1](第 99—105 页)。我国学者曹威麟等人认为,创业文化指在创业活动的过程中,人们普遍表现出来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基本态度、行为方式及其相应创立成果的总和。并指出创业文化四个方面的涵义:民众与创业有关的思想理念和精神状态;人们特定的创业行为;各种有关成文或不成文规范所隐含的社会态度;在创业实践中诞生出来的新的组织、产品和服务^[2](第 42 页)。积极的创业文化具有凝聚、导向、约束与激励功能,是创业者们的精神动力和发动机,是创业企业诞生与发展壮大的灵魂和精神支柱,对创业活动产生重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创业文化包括创业的价值体系和创业环境系统两个方面。创业价值体系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考察:从微观层面来看,主要是民众的创业文化价值体系,表现的是民众与创业有关的思想理念、价值标准和精神状态,即民众个体创业精神和创业价值观。民众的创业文化价值体系由 6 个重要因素构成:致富欲望、创业冲动、风险观念、流动偏好、吃苦精神和合作意识。从宏观层面来看,主要是支持创业的社会意识,即社会对待创业的认知态度以及社会创业和创新氛围。社会的创业态度主要是社会对创业活动的认可与支持以及对创业失败的认识态度,鼓励冒险和宽容失败是其重要内容。创业和创新氛围,主要是崇尚敬业的商业传统、守信守法的信用观念和开放的思维模式。创业环境系统主要包括与创业和创新精神相关的宏观环境体系,如创业门槛、产业基础、企业制度、金融支持、社会网络和中介服务等。

创业文化的微观价值体系与创业文化的环境支撑系统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区域创业、创新行为的发生。创业环境支撑系统对民众的创业精神起着强化和激励的作用,创业文化的价值体系也对创业环境支撑系统起着促进和改善的正反馈作用。二者的相互影响机制,表现在特定的区域上,就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质的区域创业文化系统(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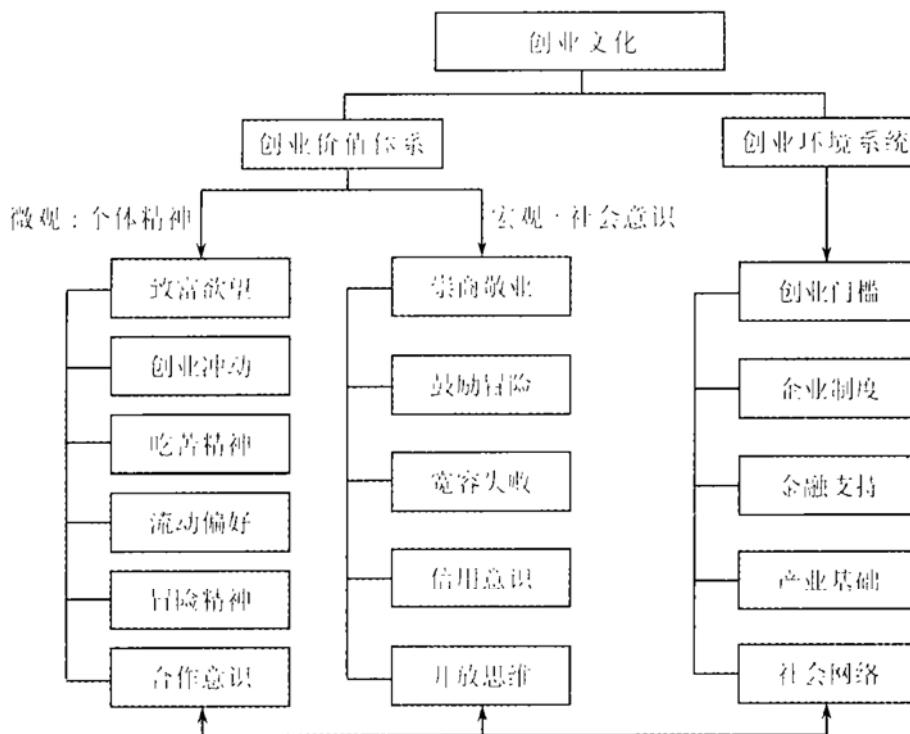


图 1 创业文化的价值体系与环境系统

二、中国典型区域创业文化的特征比较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创业与创新结合得比较好的典型区域有中关村、深圳和温州。中关村创业文化是建立在产学研基础及其校园研发文化基础上的科技人员创业文化;深圳是具有强烈的开拓意识和创业精神的移民企业文化;温州则是“人人都要当老板”的农民企业家创业模式。这三地民众的

企业文化价值体系均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分析:致富欲望、创业冲动、风险观念、流动偏好、吃苦精神和合作意识。

(一)致富欲望

致富欲望是创业的动力。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的浪潮冲击着北京的科研院所,民营科技公司的收入是国有企业和研究所的收入10倍以上,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经济效益激发了科研人员内心深处涌动的致富欲望。改善收入的冲动促使一批业务骨干勇敢地辞去公职,创办高科技企业。深圳由一个荒凉的渔村变成一个发达的现代城市,人口由80年代初的30余万发展到400多万。这其中绝大部分是移民为了寻找致富理想自发迁移而来的。来深圳打工、创业的人们各自寻梦,强烈的求富求荣欲望,将深圳塑造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创业城市。温州人血管里流动的是创业的热血,拥有空前的创业发家热情。温州百姓不依靠国家投资,也不依靠外资,甚至不需要政府的动员,在强烈的创业致富欲望和冲天热情驱使下,家家户户自觉投身于创基立业的进程中。

(二)创业冲动

创业冲动与创业的文化沃土相联系。中国三大区域创业文化有较强的地域性和区域特色,其相似之处在于,其文化核心都有着深厚的崇商敬业的商业文化传统,这种崇商敬业的创业氛围和商业文化,最有利于区域创业、创新活动的发生。中关村在传统计划体制下,科研院所吃“大锅饭”,科技人员的聪明才智得不到充分发挥。沿海发展的示范作用,促使人们强烈地渴望将自己的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通过创办企业,施展自己的创造力。一项调查表明,中关村创业的绝大部分科技人员,其创业动因是为经济发展做贡献、寻求用武之地(如表1)。深圳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积极开拓的创业精神。人们喜欢竞争,不安于现状,高昂的创业激情使深圳的生活和工作节奏明显快于内地。他们信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的市场环境吸引了大批年轻企业家前来创业,他们独立进取的人格使深圳经济朝气蓬勃,形成灵活、高效、充满活力的创业人文环境。温州人以“千军万马办企业、千家万户搞生产、千山万水找市场”的创业冲动,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特色的创业模式。温州人是勇于创业而又坚忍不拔,有炽烈的企业家精神和自主自强意识。他们争当老板而又不断开拓,具有超前的创新意识、强烈的领先意识和创业激情。温州人敢为天下先,敢争天下强,“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在创业上争先恐后。

表1 中关村科技人员的创业动因

创业动因	比例
为社会经济发展做贡献	70.3%
寻求用武之地	58.8%
为增加本人经济收入	28.1%
为科研成果寻找出路	25.9%

资料来源:于维栋.希望的火光——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三)吃苦精神

三大区域企业文化的重要特点是都有刻苦耐劳、艰苦创业、不断进取、永不言败的创业冲动和吃苦耐劳的品质。中关村第一批创业人员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往往是十数个工作人员挤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废寝忘食搞研发。据当时的一项调查,有90%的科技人员每天平均工作8小时以上,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的占48%,工作12小时以上的占17%,甚至少数人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3](第3页)。深圳在开发初期,艰苦的环境和生活条件使深圳人养成了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拓荒精神。他们在工作中崇尚务实,不空谈,“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是深圳人响亮的口号。深圳的创业历史,正是一部伟大的拓荒史,创业者居无定所、食无定规,尝尽艰辛,这种搏命和拓荒精神成就了深圳的发展,也使“拓荒牛”成为深圳精神的象征^[4](第75~85页)。温州创业家务实而不取巧,踏踏实实地做实业,有超常的市场意识和经营头脑。温州人能进能退,“既能睡地板,又能当老板”;既能享受最好的,又能承受最差的;自豪不自满,昂扬而不张扬;专注于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创业,吃苦耐劳的精神非常强。

(四)流动偏好

人员流动带动信息的流动和技术的外溢,是区域创业和创新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传播的重要途径^[5](第 143-148 页)。中国三大区域的人力资源流动偏好都很强。所不同的是中关村人员的流动主要是技术人员和研发人员的流动,其流动方式也主要在本地企业之间。企业不断发生裂变,技术人员脱离原有企业创办新企业的情况不断发生,人们“跳槽”十分频繁(如图 2)。深圳创业文化的特色是创业者“流进来”,依靠本地良好的产业组织体系、完善的制度保障和良好创业环境的拉力不断吸引外来人员创业。在深圳的创业者,大都经过在深圳漂泊异乡打工的闯荡经历。他们到处寻求创业机会,流动性很强。统计表明,在全国流动人口总数中,在省内流迁的人口中广东地区占全国的 11.04%,在省际流迁的广东地区占全国的 41.39%^[6](第 266-270 页)。而温州创业文化特色是“走出去”,创业者离土又离乡,通过不断流动寻找商机创业。温州人受海洋文化的影响,形成敢于离土又离乡、四海为家、到处闯荡的优秀品质。温州人的创业足迹遍布全国、走向世界,在全国各地有 160 多万温州人在创业,世界各国 40 多万温州人在闯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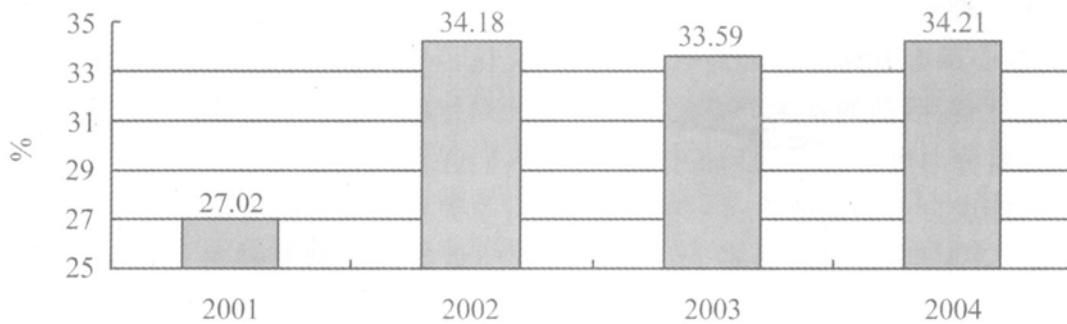


图 2 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员工总体流动率

注: 人员流动率=(流入人口+流出人口)/总人口。

资料来源: 中关村科技园区统计数据 www.zgc.gov.cn

(五)冒险精神

敢冒风险的意识,是创业家和企业家的最优秀的品质之一。Hofstede 的研究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化具有较强风险回避倾向,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是负面的^[7](第 113-115 页)。中关村的科技人员下海创业,要告别计划经济下按部就班、稳定安逸的“铁饭碗”,是需要很大的冒险精神和勇气的。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敢闯精神”就是强烈的拼搏精神和冒险意识。温州的创业家勤劳而又敢于冒风险,有特别敏锐的洞察力,善于发现市场潜在的需求,有鲜明的吃苦冒险品格。温州人敢冒险,在新市场的开拓、开发上,是风险偏好型的,不惧市场风险。他们既有模仿力又有渗透力,已把市场建到国外去了,如在意大利、巴西、美国、荷兰、俄罗斯等都有温州人办的市场。

(六)合作意识

合作意识是成功创业的关键。中关村的创业者有效地整合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资源,充分发挥企业在科技产品创新和市场化中的作用,形成产、学、研密切合作的传统,产生了诸如北大方正、清华同方这样的优秀创业型企业。在竞争中合作是深圳创业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激励深圳人锐意进取、拼搏创业的内在动力。移民来自五湖四海,共同的经历使人际间产生了宽容、和睦、团结、互助的人文关怀。在创业活动中,深圳人不会因“肥水流到外人田”而眼红,而是重双赢,合作精神是深圳创业文化的重要因素。温州人既重竞争而又重合作,重视创业者之间“扎团”和产业的“扎堆”效应,重双赢、求共生共荣。温州出“群商”,企业采取群落式的发展格局。温州人具有“帮带”的特点,即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发现了市场机会,就会有三亲六眷、朋友老乡尾随而来,规模越做越大,占领当地市场。温州的产业也具有集群基础,产业扎堆给温州带来较大的集群效益。

中国三大典型区域创业文化的比较如表 2 所示:

表2 中国典型区域创业文化的比较

区域	中关村	深圳	温州
文化内核	科技人员创业文化	来自各地移民创业文化	农民企业家创业文化
致富欲望	强烈改善收入的欲望	移民的求富求荣梦想	强烈的致富发家热情
创业冲动	科技人员创造性的释放	竞争激烈、高效的创业激情	争当老板,敢为人先
吃苦精神	废寝忘食搞研发	吃苦、搏命的拓荒精神	既能当老板,又能睡地板
流动偏好	技术和研发人员流动	人才“流进来”,流动创业	“走出去”,四海为家
冒险精神	勇于打破铁饭碗	“敢闯精神”	不惧市场风险
合作意识	产学研的合作传统	重视产业链的分工合作	“扎团”创业,共生共荣

三、企业文化推动区域发展模式的差异比较

在创业文化的推动下,三地经济发展的模式也各不相同。中关村形成了技术推动下的自主创新为主导的“内生”主导型发展模式;深圳是市场驱动下的引进、消化结合的“外引”主导型发展模式;温州在强烈的创业精神鼓励下,走出了一条以民间资本推动产业升级的资本驱动型创业发展模式,成为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示范区^[8](第8~13页)。由于创业文化的差异,中国三种创业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创业活动和经济发展活力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2004年,从以高新技术企业增长率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率表现的区域创业创新活动效率来看,相对温州和中关村而言,深圳地区创业活动更加活跃(如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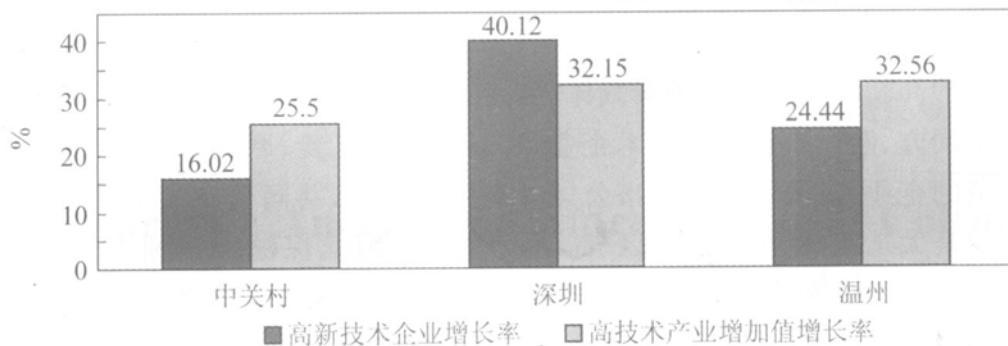


图3 中国典型区域创业活动的基本情况

注:温州数据为温州经济开发区2005年数据,中关村、深圳为2004年数据。

资料来源:张晓强.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5).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中关村科技园区网站, www.zgc.gov.cn;温州市统计局网站, http://www.wzstats.gov.cn

具体从中国三大区域的实践来看,企业文化在区域创新、经济发展主体、社会网络、经济发展载体等方面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促使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

(一) 区域创新的差异

区域社会文化的差异对区域创新特点起着重要的影响。Hoffman等的研究表明,社会文化和社会文化价值观会影响创新主体的创新意愿和行为,并直接影响企业的管理模式^[9](第549~574页)。Herbig和Dunphy指出,企业管理人员的社会文化价值观会影响企业是否创新,以及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采纳技术创新^[10](第13~21页)。中国企业文化是区域创新发展的精神动力,为创新活动提供动力机制,影响区域创新和创业的活动频率和效果,影响创新主体的创新素质、区域创新路径和方式等。企业文化差异,使中国三大区域在创新特点上差别很大。中关村是以技术研发为主导,以高技术产业化为产业方向的技术驱动型;深圳是市场驱动型,借助区域环境优势和市场机制的优势,吸引天下科技成果和创业人才,引进外国高技术企业,从而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温州是在资本驱动下,通过引入实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传统产业的创新发展。

(二) 经济发展主体的差异

中关村的创新发动主体主要是大学、科研机构,领军人物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术精英和掌握核心

技术的科学家,是以知识集聚资本。深圳已基本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大中小型企业基于产业链的相互互联结,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尤其是大中型民营科技企业成为深圳创新的发动主体,其领军人物是企业家。温州的创新则是众多的民营中小企业发动,民营企业家是区域创业、创新的主力军。

(三)资源禀赋的差异

中关村拥有丰厚的智力资源和科学家资源,知识资本雄厚,具有技术和研发的相对优势,技术转化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深圳有政策优势和濒临香港的区位优势,经济外向度较高,制度和环境是重要的比较优势。而温州相对来讲自然资源、教育和技术研发资源短缺,但其创业精神活跃,民间资本充足,创业家和企业家资源丰富,民间资本和企业家精神是其主要资源禀赋。

(四)社会网络的差异

社会网络是一种持久的社会资本。美国硅谷的成功就得益于作为社会资本的分工协作体系和社会网络,企业内部、不同企业之间、企业与地方组织(如商会、大学)之间的边界作为一个网络体系是相互渗透的^[11](第 7 页)。中国三大区域的创业创新活动的重要支撑要素就是较完善的社会网络。不同的是,中关村基于周边北大、清华和中科院等研究群体,以学缘、业缘为基础,以技术研发为纽带,形成产学研密切合作的社会网络。深圳将国内外知名高校的人才、技术、信息等综合优势与深圳的创新机制相结合,形成完善的创新网络和创新支撑体系,企业间基于产业链的联系是其社会网络的重要联结方式。温州的创业是在“一人带一户,一户带一村,一村带一镇”的模式下起步并快速发展起来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成为维系温州社会的纽带。

(五)发展载体的差异

中关村是以众多的高新科技园区为创新载体,包括海淀、丰台、昌平、电子城、亦庄五个园区。联想、四通、北大方正、清华同方、网通等知名高技术企业,IBM、微软、三菱、摩托罗拉等国际知名企业在设立的研发机构或投资的企业,以及境内外上市公司等在园内入驻,共同构成了中关村创新经济的载体。深圳的创新载体主要是大工业区、出口加工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保税区、产业集聚基地、物流园区等。温州的创新载体主要是以区域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为主要特征的各具特色的“块状经济”。

(六)软环境发展的差异

深圳产业集群有明显优势,拥有发达的产业组织能力和配套体系;温州则基于发达的专业市场,“块状经济”式的产业集群环境好;而中关村则需要推进现存产业的集群化,重构产业配套体系。深圳具有良好的政策法规体系,宽松的发展环境,经济自主性和创新性强,创业创新活力高涨。温州创业氛围十分活跃,但由于受到技术、研发资源等的限制,创新后劲受到挑战,传统的“温州模式”需要向“新温州模式”嬗变。

中国三大典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比较如表 3:

表 3 中国典型区域发展模式的差异比较

区域	中关村	深圳	温州
创新特点	技术驱动型 高技术产业化	市场驱动型 借助环境和市场机制优势	资本驱动型 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发展主体	大学科研系统 掌握核心技术的科学家	大中企业 移民企业家	民营中小企业 民营企业家
资源禀赋	丰厚的智力资源	市场优势	民间资本和企业家精神
社会网络	学缘、业缘 产学研密切合作模式	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	血缘、亲缘和地缘为联结的社会创业网络
发展载体	高技术园区	出口加工区、工业区、高新技术园区、产业集聚基地	产业集群、块状经济
软环境	产业集群环境不够,产业配套体系须重构	有产业集群优势,有发达的产业组织能力和配套体系	发达的专业市场,“块状经济”式的产业集群环境

总之,尽管中国三大区域创业文化的形成背景不同、创业价值观和创业风格各异,但其创业文化都是本区域创业和创新活动的最根本的支撑,也是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形成最重要的基础。区域创业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软实力”和“软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起着重大的影响。

[参 考 文 献]

- [1] [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2] 曹威麟,张丛林,袁国富.论中国创业文化的振兴与繁荣[J].江淮论坛,2002,(5).
- [3] 于维栋.希望的火光——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 [4] 王京生,尹昌龙.移民主体与深港文化[J].学术研究,1998,(10).
- [5] 党兴华,李莉.技术创新合作中基于知识位势的知识创新模型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5,(11).
- [6] 国家统计局课题组.中国劳动力迁移和流动的现状与特征[C].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人口年鉴(2004).北京:中国人口年鉴杂志社,2004.
- [7] Hofstede, G.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M]. London : McGraw Hill Book Company, 1991.
- [8] 辜胜阻.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及其比较研究——兼评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区域发展[J].经济界,2004,(3).
- [9] Hoffman, R. C, & W. H. Hegarty. Top Management Influences on Innovation: Effects of Execu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Cultur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3, 19(3).
- [10] Herbig, P. and S. Dunphy. Culture and Innovation[J]. Cross Cultural Management, 1998, 5(4).
- [11] [美]李钟文,威廉·米勒,玛格丽特·韩柯克,亨利·罗文.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邹惠卿)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Model

GU Shengzu , LI Junji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GU Shengzu (1956), mal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Wuhan University, Vice chairman of the All China Federation of Industry & Commerce, majoring in innovation, the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non state owned economy; LI Junjie (1980),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 tech industry.

Abstract: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includes two interactional parts, the value system and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model of three typical regions, Zhongguancun, Shenzhen and Wenzhou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is the “soft power” or “soft environment”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 has crucial impacts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model.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entrepreneurship;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model